

湖湘

刘刚 主编

湖湘碑刻

①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美术出版社

文库

刘刚 主编

湖湘碑刻

①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湖南美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湖湘碑刻①/刘刚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
2009.8
(湖湘文库·乙编)
ISBN 978-7-5356-3343-9

I. 湖… II. 刘… III. 碑刻—汇编—湖南省 IV. K87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42205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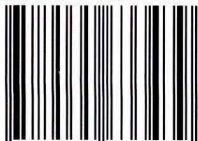
湖湘文库(乙编)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
湖湘碑刻①

主 编 刘 刚
副 主 编 刘冬华 邓昭辉 曾东生
责任编辑 左汉中
责任校对 伍 兰 谭 卉
整体设计 郭天民
版式设计 许 柳
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
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
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
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960×640 1/16
印 张 21.25
书 号 ISBN 978-7-5356-3343-9
定 价 98.00元

ISBN 978-7-5356-3343-9



9 787535 633439 >

前言

中国文字的发轫时期，甲骨上所刻的文字，大多是“方”、“尖”的形状；而商周的钟鼎所铸的文字，则主要是“圆”的形状。西周晚期，铭文趋于统一成熟，其文字之俊秀，点画之圆浑，结构之严谨，体势之雍容，风貌之古朴，风格之多样，造就了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基本格调。甲骨文和金文都有着自己的特殊风格，这对于培养碑刻艺术的独立性和多样性，起到了促进作用。这种独立性和多样性，成为碑刻艺术发展的源头。

初始碑是没有文字的，其用途有三：一是通过太阳运行的影子来观察时间；二是竖在宫庙，祭祀时用来系牲口；三是设在墓地，碑上有孔用来贯穿绳索下棺。早期的汉碑大都保留着圆孔，名曰“穿”。1986年陕西凤翔秦公大墓的墓道中，发现了四座巨型墓碑，为引棺入墓之用。汉以后，人们在碑上镌刻文字，述德纪事，树碑立传，逐渐演化为比较固定的形制。

碑刻在东汉时开始兴盛，碑的形制，可分为碑首、碑身、碑座三部分。汉代的碑较为简单，碑首与碑身连为一体，下有碑座。碑首有尖首、圆首、方首。尖首如古代的玉圭，如西安碑林藏的汉《仓颉庙碑》；圆首如汉《仙人唐公房碑》，碑中有穿，仍保存着施轱辘引棺下葬之遗意。方首如汉《曹全碑》，汉代的碑首有简单的纹饰雕刻，有瑞兽、四神等。至魏晋时，碑首演变为螭龙。碑首上有圭形的碑额，上刻碑的名称。碑座起初

是长方形，至隋唐时出现了龟形，俗称“赑屃”。“赑屃”传为龙之九子之一，好负重，故用于碑座，有长久、吉祥之意。碑身的两边称为碑侧，多刻有各种纹饰图案、画像等，以线刻的手法为主，如唐《大智禅师碑》碑侧，刻有蔓枝莲花、菩萨像等，富丽华美；唐《兴福寺残碑》碑侧有表现唐代柘枝舞的形象，造型优美生动。碑从汉代以后，除了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外，还集书法、雕刻、文学等艺术为一体，具有很高的观赏、研究价值。

根据碑的性质、内容、用途可将碑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。（一）墓碑。也称神道碑，立于墓前。内容主要记载墓主的姓名、世系、履历等，赞颂其功德业绩。（二）宫庙碑。这类碑多立于宫殿、庙宇、寺观祠堂等，一是宫殿类所用；二是为先哲圣贤、祖先建祠庙等所立之碑；三是在宗教寺观所立之碑。（三）记功记事碑。这类碑的内容比较广泛，有铭刻帝王将相功德的蜀《诸葛武侯碑》、唐《记泰山铭》；有记载某些事件和战争的，如汉《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》记录了裴岑战胜匈奴王之事，西安碑林藏宋《京兆府新移石经记碑》记载了碑林建立的情况。此外一些圣旨、诏书、符节等官方文书也以碑刻的形式表现，以冀永久。还有许多修城、建桥、修栈道，祀福、兴教建学、典章契约等纪事碑，多由当地官员和书法

家撰书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碑刻，除了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以外，还包括刻在摩崖、塔身、造像、石阙、石碣、界石、桥柱、井栏等上的文字，其意在于将名人事迹、祖先功德、名胜沿革、宗教源流及律令禁约等宣告世人，以流传后世。

碑刻艺术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尤其是汉唐盛世，书法艺术因反映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。汉代碑刻书体的雄劲、简练，唐代碑刻书体的精美、圆润，都表现了中华民族进取、向上的气派和精神，在我国碑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。

湖南地处祖国之中南，山河壮丽，风景优美，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，文化底蕴深厚。湖南碑刻遍布于三湘四水之间。

南岳衡山为我国五岳之一，有“五岳独秀”之称誉，这里寺庙林立，碑刻众多，古木参天，山明水秀。这里的摩崖石刻从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至今，延续不断，字体各异，书风遒劲，大气壮观。

南岳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境内，七十二群峰，层峦叠嶂，气势磅礴。南岳峰奇洞幽，四季景色宜人，春赏奇花、夏观云海、秋望日出、冬赏雪景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流连忘返。衡山素有“中华寿岳”之称，宋徽宗在南岳御题“寿岳”巨型石刻，现仍存于南岳金简峰皇帝岩。康熙皇帝亲撰的《重

修南岳庙碑记》首句即为：“南岳为天南巨镇，上应北斗玉衡，亦名寿岳。”再度御定南岳为“寿岳”。历代史志也常以“比寿之山”、“主寿之山”等称谓南岳衡山。南岳因而誉称“中华寿岳”。

衡山既是风景名胜之地，又是佛、道二教和谐并存之地。历史悠久的南岳，是古代帝王巡狩祭祀的地方。相传尧舜禹来此祭祀社稷、巡疆狩猎；大禹曾在此杀马祭告天地，得“金简玉书”，立“治水丰碑”，现留下白马峰、金简峰和禹王城等古址。古今往来，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、朱熹、王船山、谭嗣同等历代文人骚客慕名而来，在南岳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、词、歌、赋和数百处摩崖石刻，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之一。如唐代李泌题福严寺“极高明”石刻、宋代《还丹赋》摩崖石刻、宋代沈绅《南岳朱陵洞天》碑（石刻）、元代至元年间赵淇等题摩崖石刻、明代计宗道题“天下第一泉”摩崖石刻、熊开元“蓑云钓月”摩崖石刻、清代姜立广题“不舍昼夜”摩崖石刻、彭玉麟题“半壁烟云”摩崖石刻、李元度题“夏雪晴雷”摩崖石刻、民国邹鲁题“雍容大雅”摩崖石刻、宋哲元题“诚真正平”摩崖石刻等等。从历史角度看，这些摩崖石刻不仅年代久远，而且留有确切的公元纪年和名款，它是研究中国五岳文化和南岳地方发展史不可再生的实物资料，也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，具有很高的历史

价值。从书法艺术角度看，这些摩崖石刻中所展示的书法风格，可谓浑厚古朴、大气壮观。对书法爱好者而言，如若观临，不仅可作研习临摹书法的范本，还可以得到一次欣赏古代书法艺术的熏陶和享受。

依山傍水、风景宜人的永州，文物古迹甚多，是湖南历史文化名城，碑刻题记不计其数。唐代诗人元结，为该地石刻题记密集的朝阳岩和淡岩写下了《朝阳岩下歌》，诗曰：“朝阳岩下湘水深，朝阳洞口寒泉清，零陵城郭夹湘岸，岩洞幽奇当郡城。”

永州地处湘南，旧名零陵，为中国最古老的地名之一。就地理位置而言，系“荒蛮”地带，山势诡异，景致幽雅。早在唐宋时期，就有许多有文学天赋的官员遭贬，流放至此，他们在此留下了众多的诗文墨迹，这些墨宝被一一镌刻于碑石上，从而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来此观游。许多文人在观游后，又再次留下诗文石刻。如此循环，不仅为记录历代名人在永州各地活动足迹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，增添了碑刻的数量，而且还使这里文化种类繁多，历史文化底蕴更深厚，其中滥觞于唐代碑刻形成发展起来的碑文化，是永州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，同时也是中国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唐代元结开浯溪摩岩石刻之先河，直至两宋，兴起了永州石刻艺术的空

前繁荣。大唐元结、颜真卿等诸名家纷纷在浯溪、阳华岩等地留下墨宝真迹；尤其是宋代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、杨万里等人的碑刻书法，写下了对先哲名士的崇拜，写满了不拘守旧法的意气，写出了社会经济的一时繁盛，写美了永州的喀斯特地貌。如此的文化积淀，不但成就了浯溪、阳华岩、月岩、澹岩、朝阳岩等多处碑刻胜地，而且为后来人提供了一大批极富人文意蕴又极具历史价值的珍品。虽然这里曾经在蒙元近百年一度消沉，但是到明清时期，当地的碑刻艺术再次复苏、兴盛。明人由祭碑重振碑文化，清人何绍基、杨翰等以碑立史，功绩卓著。周敦颐后人的《先祖墓碑记》、万历四年的《抚瑶颂碑》、杨翰的得意之作《浯溪同话》以及吴大澂的三铭一诗，以镌刻的碑石为永州增添了一分古韵。碑刻，这一曾创造永州辉煌的文化艺术，再度弘扬和展示了碑文化的精髓，为我们感悟历史、解读永州、品味艺术作了诠注。

南岳摩崖石刻、永州碑刻（包括浯溪碑林），构成了湖南碑刻主体板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历史文化名城、湖南首府长沙（有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、江夏黄仙鹤勒石的《麓山寺碑》、宋代何致摹刻的《岫嵎碑》等），山势奇丽、万木葱郁的湘南郴州（有秦观作词、苏东坡作跋、米芾书写、史称“三绝碑”的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摩崖等），湘北重镇、

风光秀丽的常德（有唐代著名诗人杜牧、李群玉等的《桃源洞》诗碑），山势峻峭、景致如画的湘西（有《复溪州铜柱记》铜柱铭刻等）和险峰奇岩、碧水青山的张家界（有清代龙起涛《桑植凿茅岩记》碑等）等，都是历代名碑名刻集聚之地，为记载湖南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，镌刻了宏伟的篇章。

《湖湘碑刻》一书，意在汇集上述碑刻的精华，弘扬兼容大气的湖湘文化，彰显独特诡异的湘楚艺术，揭示深厚的湖南历史文化积淀。

陈建明

2009年4月于长沙

目录

湖湘历代碑刻综述	1
一、唐以前的碑刻	4
二、宋元碑刻	17
三、明代碑刻	36
四、清代碑刻	44
五、民国碑刻	58
 碑刻作品	 63
唐以前的碑刻	64
宋元碑刻	84
明代碑刻	146
清代碑刻	192
民国碑刻	300

湖湘历代碑刻综述

湖湘历代碑刻综述

刘 刚

2

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的进程中，湖南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遗迹，湖湘碑刻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碑刻是历史文化遗存的载体之一，是占据物理空间的以雕刻为表现手段的造型艺术，是综合雕刻、书法、文学、历史，集实用性、观赏性与文献性于一体的艺术作品，也是研究和继承发扬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珍贵资料。

作为中国书法艺术载体之一的碑刻，就是将书写好的墨迹复写于平整的石板（或石壁）或木板上，然后镌刻而成。后人经椎拓，以拓本形式供欣赏和观摩、临池，称碑帖。碑刻一般包括：碑、建筑刻石、摩崖刻石、墓志等。碑由底座、碑身、碑额组成，底座有时雕成赑屃（乌龟）形象，碑额则浮雕成双龙盘绕，碑身镌刻碑文，有时碑文背面，即碑阴处或两侧均刻有文字。著名的碑汉代有《张迁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乙瑛碑》，东晋有《爨宝子碑》，北魏有《郑文公碑》，唐有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、《颜勤礼碑》等。建筑刻石主要是在石质的建筑物上镌刻含有纪念性或题记性的文字，如汉代的石阙、石祠，北朝的石窟等均有刻石文字，著名的有汉代的《少室石阙》、《芈他君石祠堂石柱》，西晋的《枳阳府君神道阙》，北魏的《龙门二十品》等。摩崖刻石，一般刻在较平整的石壁或山崖上，著名的有汉代的《西狭颂》、《石门颂》，北魏的《石门铭》，北齐的

《泰山金刚经》，南朝的《瘞鹤铭》，唐代的《大唐中兴颂》等。有的摩崖刻石亦被列为碑，如北魏的《郑文公碑》。墓志专门用于丧葬，内容为墓主人行状，作为书法艺术来讲，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最为丰富，主要有《王浚妻华芳墓志》、《刘怀民墓志》、《刁遵墓志》、《张黑女墓志》等。

碑刻在中国古代文化中，有着重要的地位。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，当甲骨文消泯、金文衰微之际，古人用刀笔赋予冰冷的石头以艺术生命和历史内涵。碑刻开始成为文字的重要载体，记录着历史沧桑的脚步，折射着文字嬗变的过程，展现着中国古代灿烂的书法艺术，最终形成独特的碑刻文化。它是我国的传统艺术之一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风貌自立于人类社会的文化艺术之林。它的艺术价值体现在书丹镌刻（或直接奏刀契刻上石）构成汉字群体的优美造型，并形成各自的风格、面貌。简而言之，碑刻就是刻在石上的书法艺术。书法注重笔墨情趣，讲究用墨、运笔、结构、章法、气韵等表现手法；碑刻则讲究刻字的刀法，它保存了书法的笔法（笔画线条）、笔势、笔意和结构的形神。许多古代名碑上同时署有书者和刻者的名字。如唐《麓山寺碑》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、江夏黄仙鹤勒石；北宋韦弁《步瀛桥记》碑为韦弁记并书，周唐辅题额，唐弼召刊；蔡邕《九疑山碑》系南宋李袭之于淳祐六年（公元1246年）命李挺祖书以补刻者；元至元年间题摩崖石刻系赵仁荣同赵淇来游住山洞泉时题，法师费希升上石；明欧阳玉振《甘棠八景》诗碑为欧阳玉振书丹，八桂匠氏李永森刊；戴嘉猷《重修汨罗庙记》碑，原碑刻立于嘉靖二十年（公元1541年），已毁，现碑为同治八年（即公元1869年）湘阴虞绍南重书，黄世崇跋，延龄氏刻等。这说明契刻技法和镌刻者是为世人所重的。著名书家王羲之、颜真卿等曾怕有的刻工不佳而亲自书丹刻石，足见刻碑技术和书法艺术密不可分，相辅相成。可以说，碑刻艺术就是书法艺术的体现。

汉代碑刻书体的雄劲、简练，唐代碑刻书体的精美、圆润，都表现了中华民族进取、向上的气派和精神，在碑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。宋元明清的碑刻，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繁衍的。湖湘碑刻遍布三湘大地，湖南主要

的文化名城和风景胜地，都是历代名碑名刻集聚之地，为记载湖南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，镌刻了宏伟的篇章；为弘扬中华独特的经典艺术，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。

一、唐以前的碑刻

三国时期的石刻，虽与汉末的碑刻隶书差别不大，但其字形渐趋于方，其字势向纵的方向发展。因此，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。三国魏的隶书，方笔直势居多，倘若笔画没有波磔的话，那就与楷书很相近了。吴国地处江东，其书险怪诡譎，大有楚风。所以，吴国出现了一些极为著名的书法家，并在湖南留下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。

例如三国《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》，俗称《谷朗碑》，书法端庄遒劲，颇具汉隶风趣。尽管名为分隶，而实际上其体势已与楷书非常近似，所以也有将之定为楷书的。虽说与后来的晋唐楷体相比，隶书的趣味还比较浓，但方整的结体，圆劲的笔画，质朴浑厚的体貌，与同时期中原和北方的诸碑还存在一定的差距，是我国难得的承前启后的重要碑刻之一。

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 三国吴碑刻。额题“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”。凤凰元年（公元272年）立于耒阳。字体介乎楷隶之间，是楷书初创时期的重要碑刻。碑由青石制成，高176厘米，宽72厘米。碑额11字，作隶书碑文18行，每行24字，字径3.5厘米，无撰书人姓名。此碑原在湖南耒阳县城东谷府君祠内，清代移置县城杜甫祠（今耒阳县第一中学）内，后又迁置蔡侯祠（传为蔡伦故居，在城内蔡子池畔）内保存。1966年被砸成三截，弃于水塘中。1979年捞起修复，中有断裂残破痕，仍置蔡侯祠内。碑之两侧原有谷氏后裔题名，清初尚存，后渐磨灭。

九真，南越赵佗置，公元前111年入汉，辖境相当今越南清化全省及义静省东部地区。三国吴末以后，辖境逐渐缩小。

考《吴志》：孙休永安六年（公元263年）五月，交趾郡吏吕兴等反，杀太守孙谡。遣使如魏，请太守及兵。七年，分交州置广州。孙皓元兴元年（公元264年），魏置交趾太守。吴宝鼎元年（公元266年），遣交趾刺

史刘俊，前部督修则等入击交趾，为晋将毛晃等所破，皆死。兵散，还合浦。吴建衡元年（公元269年）十一月，遣监军虞汜等就合浦击交趾，三年，破交趾，擒杀晋所置守将。九真、日南皆还属。谷朗为九真太守，当在此时，即凤凰元年之前一年（公元271年）。谷朗病卒，当在凤凰元年，其立碑亦当在此时。

碑文除叙述谷朗生平及其德行，出仕经历与所作之贡献外，同时还记载了当时南方边陲之治乱情况，颇有史料价值。

碑主谷朗（公元218—272年），字义先，东汉桂阳郡耒阳



三国《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》（局部）

马水人，出身官宦家庭。谷朗成年后，正值三国鼎立时期。朗出仕吴国。先后任郎中、尚书令史、郡中正、长沙浏阳令、都尉、尚书郎。后调入朝中，拜五官夕郎中，迁大中正大夫，专司察举人才。平乱后谷朗迁九真太守。吴凤凰元年（公元272年），谷朗病逝任所，归葬耒阳。为昭示其功绩，时人刻有此碑。

此碑文辞古雅，书法端庄，浑劲高古，绝去痕迹，不见起止转折之象，

与其他汉碑一般隶法不同，实为隶书转变为楷书之始。它为省内唯一仅存之吴碑，亦有人认为此碑为楷书而多隶意。当然同后世魏碑、唐楷相比，它还带有较浓的隶味。其结体方整，笔画圆劲，书风浑朴古雅，与曹魏诸刻风格稍异，但同为开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。此碑在清代以前，惟见欧阳修、赵明诚两家著录。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云：“其字遒劲，亦有汉分隶法。”严可均谓其：“隶法不恶，刻手极拙。”康有为称其古厚，为真楷之极。

魏晋时期因屡颁禁碑令，故碑刻数量不多。但也产生了一批较好的碑刻，如流传至今的魏《范式碑》、吴《天发神谶碑》、魏《上尊号碑》、魏《受禅表碑》等。据《寰宇访碑录》所载，有几十种碑刻，今皆不见。而其时民间小型墓碑却悄悄增多，大多为砖刻，为后世墓志的兴盛开了先河。南北朝时，碑刻再度兴盛起来，尤其是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，涌现出一批独具风格的魏体作品。魏《龙门二十品造像题记》，北魏《贾思伯》、《崔敬邕》、《张黑女》等墓志，北魏《石门铭》、北齐《泰山经石峪》等摩崖，都是魏碑的代表作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谓：“佳书妙制，率在其时。延昌正光，染被斯畅。考其体裁俊伟，笔气深厚，恢恢乎有太平之象。晋、宋禁碑，周、齐短祚，故言碑者，必称魏也。”魏碑多为正书，瑰丽谲奇，其运笔迅起急收，切笔抢锋，顿挫尽极笔力，有雄强之气。魏碑对唐代正书的发展影响很大，直至清代乾嘉以后，众多书家“莫不口北碑，写魏体”，出现了变革创新、书法中兴的局面。

晋朝距汉时尚近，石刻多完好者，可供晋人深造，发展书学有良好的基础。可惜由于曹魏时已禁立碑，晋承袭曹魏禁碑之旧习，故亦下禁碑之令，其理由以“妄媚死者增长虚伪，而浪费资财，为害其烈”为辞。故晋代遂向帖学发展，所立碑版不多。湖南的这一时期的碑刻更是难寻，唯东晋潘氏衣物滑石券在长沙的出土，填补了这一空白。而潘氏衣物滑石券上的字体，属于民间书法，为行楷类书体。

东晋潘氏衣物滑石券 1954年5月，长沙市北门桂花园基建工地发现了一座东晋墓。出土的文物不多，但却保存了一件极为珍贵的“墓券”，即东晋升平五年（公元361年）潘氏衣物滑石券（下简称“衣物券”）。衣